

# 铁门悲欢

## ——“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

郑祖安

近代中国内战外患，烽火不绝。自民国以后，以军阀之间的混战、日本侵略中国为最经常和严酷，连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不能免。相反，因其是内外要冲、繁华之都，更成了争战要地。但不同的是，上海有着全国最大的外国租界，即外国人在华最重要的基地，它们由外国人统治、管理，在中国内战和中日战争中具有“中立”的地位，因此，当战火来临和被战火包围之时，却能在一定地域中和一定程度上阻隔战争、游离战争。这一情况使发生在上海的任何战争在态势上就比较特别，也使租界在战争进行时不免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本文要涉及到的对中国难民的保护作用便是其中之一。

战争造成了大批、大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为求生存、安全，不得不开离住地，流向别处。租界既然是可以阻隔战争、游离战争的特别区域，中国难民自然要源源不绝地涌向那里。面对中国难民潮的巨大冲击，租界当局采用了也纳也挡的办法，即既接纳了相当多的难民群，也将大量的难民群阻挡于外，这就造成了中国难民悲欢不同的两种不同境况。

不过如将两者进行比较的话，在客观上前者还是属于主流，也即租界对无数中国难民起到了相当程度上的保护作用。也因此，当现今在更全面地研究租界历史及其对近代上海和近代中国发展的关系时，还得重视它作为一个特别的地区，曾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状况中，产生过不容否认的极大意义。

### 一、隔离障碍：铁丝网、铁栅门和砖墙来历

自1845年第一个英租界建立起，到1899年英、美租界合并成的公共租界界域大扩张、1914年法租界以扩大警权为名实现的地盘大扩充，两租界虽然均和华界明确划分了分界线，但双方却一向都未在交界处设立边界分隔线，而仅只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树立了刻有有关文字的界石。

但这一种办法，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变化。

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财富之城上海，挑起了“江浙战争”。两军在上海外围大举兴兵，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地难民大批向上海避来。上海两租界当局立即感到了战乱对租界的威胁，于是在租界边线打木桩、扎铁丝，并派出军队和万国商团驻扎各处，从而形成了一道“铁丝网”防护线。

到1927年，北伐军节节挺进，北上途中相继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继挥师东向，直逼长江下游。江浙和上海一带又进入了大动乱中，难民新一轮向上海，特别是租界中涌来。3月北伐军赶走旧军阀，攻克上海华界，7月，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在这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上海租界作为外国列强在中国最要紧的营盘，虽然不致于如汉口、九江的租界那样会被收回，但是，从新政府到广大民众，发出的“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租界”的呼声日响一日，反帝浪潮势不可遏，租界当局从心理到防护，都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开始在界线周围的路口、桥上先后造起了牢固的、永久性的铁栅门。因为它们是在建在界线的租界内侧，更主要的是，经历前述的战乱，租界已不可否认地被认为是可以脱离战争的安全之地，而租界虽然打起了铁门，却仍是对外开放的，并不影响人们的进出来往，因此，两租界这一

举动，在当时显然没有遭到大的反对和指责。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逐步建造起来的铁栅门，其分布的位置大致如下：

#### 公共租界铁栅门位置

吴淞路、靶子路（今吴淞路、武进路）口  
北四川路、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口  
北江西路、靶子路（今江西北路、武进路）口  
北河南路、宝山路（今河南北路、宝山路）口  
北山西路、界路（今山西北路、天目东路）口  
克能海路、界路（今康乐路、天目东路）口  
北浙江路、界路（今浙江北路、天目东路）口  
爱而近路、北浙江路（今安庆路、浙江北路）口  
海宁路、甘肃路（今海宁路、甘肃路）口  
热河路、新疆路、（今热河路、新疆路、）口  
开封路、北西藏路（今开封路、西藏北路）口  
阿拉白司脱路、北西藏路（今曲阜路、西藏北路）口  
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堍  
乌镇路桥堍  
新闸路桥桥堍  
新大桥（今恒丰路桥）桥堍

#### 法租界铁栅门位置

法兰西外滩、方浜路（今中山东二路、东门路）口  
小东门路、法华民国路（今方浜东路、人民路）口  
闵行路、法华民国路（今真如路、人民路）口  
福建路、法华民国路（今枫泾路、人民路）口  
太古路、法华民国路（今高桥路、人民路）口  
舟山路、法华民国路（今龙潭路、人民路）口  
台湾路、法华民国路（今黄代路、人民路）口  
新开河、法华民国路口，（今新开河南路、新开河北路与人民路交界处）  
老永安街、法华民国路（今永安路、人民路）口  
天主堂街、法华民国路（今四川南路、人民路）口  
兴圣街、法华民国路（今永胜路、人民路）口  
吉祥街、法华民国路（今江西南路、人民路）口  
紫来街、法华民国路（今紫金路、人民路）口  
老北门大街、法华民国路（今河南南路、人民路）口  
典当街、法华民国路（今金门路、人民路）口  
麦底安路、法华民国路（今山东南路、人民路）口  
磨坊街、法华民国路（今盛泽路、人民路）口  
郑家木桥街、法华民国路（今福建南路、人民路）口  
新桥街、宁波路、法华民国路（今浙江南路、淮海东路、人民路）口  
自来火行东街、法华民国路（今永寿路、人民路）口

八里桥路、法华民国路（今云南南路、人民路）口  
皮少耐路、法华民国路（今寿宁路、人民路）口  
华盛路、法华民国路（今会稽路、人民路）口  
敏体尼荫路、麋鹿路（今西藏南路、方浜西路）口  
白尔路、蓝维蔼路（今自忠路、西藏南路）口  
辣斐德路、蓝维蔼路（今复兴中路、西藏南路）口  
安纳金路、蓝维蔼路（今东台路、肇周路）口  
茄勒路、蓝维蔼路（今吉安路、肇周路）口  
平济利路、蓝维蔼路（今济南路、肇周路）口  
劳神父路路、蓝维蔼路（今合肥路、肇周路）口  
康梯路、蓝维蔼路（今建国东路、肇周路）口  
杜神父路、蓝维蔼路（今永年路、肇周路）口  
徐家汇路、蓝维蔼路（今徐家汇路、肇周路）口

法租界从东面的十六铺向西，再向南直到斜桥，在长距离中布置了多达 36 处的铁栅门。但到徐家汇路东头却停住了，未在南面边界线再继续向西筑门，这是因为：当时紧贴徐家汇路南，有一条“肇家浜”与徐家汇路平行，向西一直伸展到法租界的西端徐家汇，正好可作天然屏障。不过这条肇家浜到 30 年代也发生了变化，使法租界当局不得不再大兴土木。

这就是自 1926 年外通黄浦的陆家浜被填没改建成陆家浜路后，肇家浜的外潮来水顿时失去，于是水位大大降低，尤其是东段河道加快淤塞。30 年代中期，华界市政府不得不将斜桥至日晖港一段河道先行填没，改成道路。但这样一来，这一段法、华交界地，就解除了原先的水流阻隔，变成了可以直来直去之地。到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法租界为去除从南边而来的麻烦，竟狠下决心，雇佣大批小工，从斜桥至日晖港筑起一道厚实砖墙。这道墙长达近 4 华里，仅在几个要道路口和桥上，开了铁栅门，供进出的需要。如同以前的河流一样，法租界将这道砖墙当作了永久性的防护屏障。

当法租界大兴土木的时候，随着中日战争的大举展开，日益激烈，北边公共租界的防卫情况也在发生极大的变化。以前公共租界的西面是以北西藏路为防线的，故 20 年代修建的铁门，在 1932 年“一二八”战争主要拉锯于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时，尚可发挥相当的作用。但这次战争规模空前，凶焰弥天，难民如滚滚大潮涌向租界，公共租界的西面防御线不得不向西大举推展。按理，这一防御线应延至公共租界的西界，即 1899 年确定的小沙渡向南至静安寺一线，但这一线已为人口和建筑均已密集的市区包围，于是租界当局就乘机向中国政府实际已完全无力控制的前越界筑路区推进，最终将其定在紧靠华界环城大道中山路的沪杭铁路里侧。租界派出英军、美军、意大利军，从新垃圾桥南堍，沿苏州河南岸一直向西，直达远方的苏州河沪杭铁路桥，然后向南沿铁路线东侧和凯旋路，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法华镇路、安和寺路（今新华路）等，直至虹桥路。在这一线打桩密置铁丝网，各路口下掘地壕，上堆沙袋，配备机枪钢炮，驻军和巡捕日夜分班把守，严重戒备。

其时北边的虹口、杨树浦早已为日本势力所占据，公共租界当局实际已无法控制和管理那一大片地区。但在中部、西部、南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建造了如上述的铁丝网、铁栅门和砖墙，还可以凭借河流、铁路线等固定的分隔物，这样就建立了自 1845 年以来所长期没有的，较为正规的租、华两界分界线。有意思的是，这是在战争和动乱的特别的环境和原因中生成的，而且是以防御线为形式和标志的界线。

## 二、两次难民大潮

在1937年的中日战争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前后经历了两次难民潮的冲击。

第一次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实际早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当上海黑云压城，战争随时会一触即发的时候，租界外的人们，特别是日人盘踞的虹口地区的人们，难忘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惨痛教训，已有人开始向南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迁移。到“八一三”的炮声一响，虹口、闸北成了中、日军队恶战之区，于是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能走的，无论贫富，便大批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是沪东虹口、杨树浦过苏州河向南的最近的通道，整个大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有人曾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的猛烈状况：“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sup>①</sup>“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下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澈心脾。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sup>②</sup>虹口、杨树浦的大部分地区本就属于公共租界的范围，故苏州河东面的桥梁通道，对虹口、杨树浦来的难民，是必须开放的。但界路和北西藏路一线，面向华界，当8月13日战争一爆发，公共租界当局便将所有的铁门对外关闭。这样，闸北地区的大部分难民要进入租界，就无法像虹口、杨树浦的难民那样可以直接通过，而必须从北西藏路向西过苏州河进入。如果在新闸桥、新大桥上不易通过的话，还可从新垃圾桥西至新大桥之间的河岸上，设法摆渡至南岸，进入租界。

南边的法租界情况又有所不同。战争进行时，日军派出飞机轰炸南市，同时中、日飞机也在空中交战。因此南市虽然不是战区，但属炸弹飞临的危险之地，南市的部分居民便大多向近旁的法租界流来。不过，南市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战争，境况不一样，其难民流向法租界的势头，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涌向公共租界的大潮相比，此时要小得多。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铁门自8月13日起关闭管制，每天晚上10时至第二天早晨5时还实行宵禁。不过实际上在起先及以后，没有也很难做到整日的绝对封闭。如公共租界的难民先时可以用渡河的方法，迂回进入界内；法租界起先采用上下午各开两次的办法，如8月14日上午10时半，在法租界与南市交接的各个要口，铁栅门上的小铁门（边门）都打开，让行人通过；到下午3时，又将东新桥街、八里桥街等处的大铁门也打开，让往来的行人、车辆通过。以后两租界都采用严格掌握，但仍是适度开门的方法，其中法租界的开放度较公共租界为大，除将一些主要地方的铁门关闭外，其余地方的边门常开。而当两租界内的无数难民收容所、慈善机关等到界外去接收大批难民进租界时，两租界的当局是都让它们的车辆、人员顺利进出铁门的。

第二次难民潮是10月至11月间。在日本海、陆军事力量的猛烈进攻下，大场于10月26日失守。大场一失，东线闸北、江湾的中国守军势必要被日军围歼，于是只得撤向江桥、南翔一线。日军乘胜大举挺进。江桥、南翔以东，特别是闸北、江湾、大场、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极点，便沿着沪杭铁路线滚滚南下，想通过公共租界的西部防御线，投入租界。

11月4日晚，日军在南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并迅速扑向松江，上海南部受到包围。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猛攻南市，南市及远至徐家汇的华界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可能，这一带的居民已毫无安全可言，于是以汹涌之潮涌向相邻的法租界。

然而这一次两租界的情况和当局对难民的态度，与上一次相比，已有改变。就公共租界来说，因西面的防御线远移到了沪杭铁路线，原越界筑路区西部地域尚有一些空地，因此租界的这一警戒线，有时也接纳一部分沿铁路线急下的中国难民，让他们避入到租界里。但公

<sup>①</sup> 《申报》，1937年8月14日。

<sup>②</sup>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上海华美出版公司1938年版，第15、16页。

共租界的中区、法租界内，经上一次延续达二个多月的难民潮的冲击，界内所有的难民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大量的新难民已到了流落、遍布各处街头的地步。两租界当局出于接待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租界自身安全计，宣布暂时关闭对外交通。法租界因直接面对南市，最为严重，在 11 月 10 日发出关闭铁门的通告，通告作如是说：“-----如遇南市一带飞机轰炸或战争发生之时，界内居民务希居家勿出。再衔接华界边境之各区域内，暂时禁止交通，仰各界注意为要。”<sup>①</sup>

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便被铁门挡在了界外，其时头顶时有日机飞掠轰炸，有家不能归，财产不随身（为进租界，不能随带行李，否则进不了铁门），饥寒交迫（时天气已转冷），一幕幕凄惨、悲伤的苦难便出现在阴冷的、无情的铁门边，以下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些断片：

“-----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惨不可言。”<sup>②</sup>

“民国路上塞满了三四天没有滴水进口的奄奄待毙的男女老幼。那几天又下着雨，就只在雨中淋。法租界的铁门关得铁紧，法国兵和安南兵守卫着门里的铁丝网，不许难民越雷池一步。”<sup>③</sup>

铁门突然的开了，饥饿的人们，不，已经失去了人类意识的疯狂的饥饿之群，如黄河决口向着租界里潮涌而来，他们忘记了已有三天没有饮食，凭他们疲惫不堪了的躯壳，冲！冲！向着租界里冲！残忍的木棍在“人”的手中使劲地挥动，在另一种人类的头脑上沉重的打着打着，不绝地打着！脑壳碎了，鲜血在流！前面的人跌下地去了，后面的，那里顾到，尽是在他的身上踏过去，踏过去：冲！冲！向着租界里冲！<sup>④</sup>

“（铁门里）几个声势汹汹的巡捕把守住，非要有通行证才可进去-----天空中出现了一架日机-----于是起了个重大的纷乱和骚动，后面的人尽力向前拥。男的叫，女的哭，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但是，他们继续互相拥挤，谁也不能从这堆人群里，救出那被挤倒的孩子。假如蹲下来，就有遭到同那孩子一样的命运。”<sup>⑤</sup>

“有一家前门在民国路，后门在法租界的烟纸店的主人，看不过店门外的同胞的那种惨状，开前门放进了一些人，法租界当局要按人处罚他一百元。结果，他牺牲了那铺子。”<sup>⑥</sup>

“有一家茶叶店的主人，因为有三千元的现钞留在南市店里，待去拿了要回进租界，已经来不及。他饿了三天，出十块钱买不到一杯水。最后出了几百块钱才由一家法租界

<sup>①</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1 日。

<sup>②</sup>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 37 页。

<sup>③</sup>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汉口群力书店 1938 年版，第 51 页。

<sup>④</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4 日。

<sup>⑤</sup>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 31 页。

<sup>⑥</sup>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52 页。

的居民，把他用绳索吊上楼。回进租界，他已经半死了。”<sup>①</sup>

### 三、租界关闭铁门的无奈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铁门、铁网和砖墙，隔离了租、华两界的交通，阻挡、排斥了大批的中国华界难民，如上述所举的一些情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铁门是如何的狰狞、冷酷，在它们的阻隔下，华界难民经历了饥、寒、风、雨、挤、压、病、死等的煎熬，受到了流浪与炮火中的如在地狱一般的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无限伤痛。

被阻隔在铁门、铁网和砖墙外的难民自然是十分值得同情的，对那些举起木棍、皮鞭驱逐难民的租界巡捕也深应痛恨，然而，全面地看，两租界在最严重的时候将所有的铁门基本上都紧闭，强行堵住难民的进入，却也是在非常时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以下我们将目光从铁门外移向铁门内，对两租界的内部进行审察一下。

当“八一三”的炮火一响，中、日军队在华界的闸北和宝山，公共租界的东区即虹口、杨树浦一带恶战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宣布：“本局迫不得已，只能顾及事实，而注重于维持所能切实控制区域内之安宁与秩序，并遵守严格之中立。”<sup>②</sup>法租界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中立”者，就是两租界不参与中、日双方的战争行动，同时也要求双方不准将战火延及两租界地区。在“中立”的前提下，两租界在起先都能做到：1，容许和接纳因战争而生成的双方难民（实际主要是中国难民）进入界内；2，容许双方界外非军事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等转移、设立于界内；3，在解除武装的条件下，容许和接纳双方的败兵、散兵进入界内。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当第一次难民大潮涌来时，大批的中国难民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两租界内，据 8 月底的报纸报道，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高峰时曾达到 70 万人左右。<sup>③</sup>这些难民或投亲靠友，或借宿旅馆客栈，或租赁余屋空房。许多无依无靠、无财无业的难民则被中外慈善机关、宗教团体、同乡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建立的各种难民收容所收容。这些收容所利用界内的游乐场、学校、寺观、会馆公所及其他各种公共场所、闲置空地，广泛开辟场地，以安置更多的难民。两租界当局在这方面也是尽力地予以鼓励和帮助的，因这有利于解决界内的难民问题。以下是工部局卫生处对界内收容所和所收难民数的一些统计：<sup>④</sup>

#### 难民收容所及收容难民数统计

时间	收容所数量	收容难民数
8.30	105	52106
9.10	116	61835
9.23	121	61896
10.17	125	56196
11.4	132	71452

然而，尽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有旅馆客栈、余屋空房可借宿暂居，有上百的收容所有可能会接纳，但是几十万的庞大难民之数，实在是太大了。当时 1937 年公共租界的人口约为 122 万人，但北区和东区已不受工部局控制，因此如扣除两区的人口，中区、西区及越界

<sup>①</sup>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52 页。

<sup>②</sup>1937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第 24 页。

<sup>③</sup>《立报》，1937 年 8 月 31 日，实际数字可能还要超过此数。

筑路区的人口约为 50 万人，加上法租界的总人口 48 万左右，共为近 100 万人。<sup>②</sup>100 万左右的人口要接待 70 万以上的外来者，那么就是每 1 人要接待 0.7 个难民的比例，这是两租界的居民人口及现有建筑和环境所难以承受的。这样终于到了各收容所和整个租界区人满为患的地步了。难民们，主要是那部分无财无业、无依无靠的人，在各难民收容所无力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只能流落街头、食宿街头了。于是，在铁门外出现极度悲惨苦难场面的时候，在铁门之内的街头巷尾，也出现了另一种无限艰难困苦辛酸场景。以下是当时有关这一场景的一些记载：

在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余人，大都狼狽不堪，饥寒交迫，厥状殊惨。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前往散放，聊以充饥，此外并无其他给养。<sup>③</sup>

法租界各处里弄中，每晚露宿难民，颇为拥挤，且连日阴雨，各难民如落汤鸡一般，易染疾病……<sup>④</sup>

无量数的生命，他们是盲目地塞进租界里来了，他们没有带得在战区里的财产，——他们想保障他们的生命而丧失了所有的财产，然而不知道丧失了财产后的生命也是没有保障的。房租在二房东的算盘下吓得他们吐出舌头来——要发现招租的红纸条，几乎要看花了眼睛。于是，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弄堂的过街楼下，都做了他们“暂避风雨”之所。<sup>⑤</sup>

“从战争的恐怖中救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七十多万难民，处在饥饿、寒冷、疾病的死亡线的威胁之下。

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随处都可以碰见这些战争的牺牲者。男人、妇女、儿童聚集停车处或商店橱窗的前面，——有些人坐在行人道的边上，蜷曲着，身上背着严格蓝布包，或者一卷席——这是他们所有的一切。”<sup>⑥</sup>

因难民成千上万、持续不断地从外涌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内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

首先是粮食、食品和燃料供应发生了困难。租界原先的物资储存应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因此一时不至于会很快出现断粮、断食品、断燃料的情况。但由于战争在上海周围进行，租界与外界的联系大受阻碍。物资补充的来源在缩小，难民却在成倍成倍地增长。进少出多，租界内的粮食、食品、燃料的价格便自然要上涨了。米商、食品商、煤商为牟取厚利，又借机囤积居奇，关门停业，更引起了物价的飞腾暴涨，市面的混乱。如米商经常观望不动，营业者少，即使开门的，对每人仅限购 1 元之米。到 10 月时，租界的粮食供应已出现危机，工部局和公董局用不得不分别紧急向安南西贡大批购米运沪。

至于副食品，租界内肉类、鱼类有相当的冷藏储存，最困难的是新鲜蔬菜的供应。“八

---

<sup>①</sup> 录自有关日期的《申报》。

<sup>②</sup>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附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罗志如：《统计表中的上海》，第 37、38 页。

<sup>③</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6 日。

<sup>④</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9 日。

<sup>⑤</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8 日。

<sup>⑥</sup> 《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 1 辑，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年。

一三”战争爆发后，江湾、罗店、浏河、大场等地陆续都成战场，这些地方对租界供给越来越减少，随着战争的深入，沪西、浦东的供应也大受阻碍，于是只能靠农夫零零落落的私运贩入了。新鲜蔬菜是居民每天都要消费的副食品，不能长久储存，还有燃料方面，随着天气的逐步转寒，需求量在加大，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其次，是衣被、日用品的缺乏。来自战区的难民大多都是只身逃出，一无所有，或只带有一些随身物品。而从南市来的大批难民在通过法租界铁门时，要受到巡捕的监视，肩挑车载的庞大行李不准通过，否则你就进不了租界。这样，来到租界里的难民，特别是收容所的难民和蜷缩于街头弄里的难民们，极其地缺少衣被和日用品。自9月夏天一过，天气渐渐转凉，缺衣少被的难民日子越来越难过，饥寒交迫，导致许多人染病，有些被冻死。各个难民收容所全靠社会各界的捐献维持，常见收容所经常在报上呼吁各界人士慷慨给予捐助钱物，但捐献显然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至于街头弄里的难民得不到如收容所那样的正规帮助，只能靠各方零星的施舍和自己想办法，例如要自己做点饭，从锅柴到碗筷都得想法去借讨，其艰难的境况是可以想像的。

第三，威胁最大的是疫病的流行了。战争爆发后，各医院人满为患。源源不绝的难民的涌入，普遍难得医疗的保障。拥挤、混乱、饮水不洁、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小病得不到控制，众多的原因使难民集中地的卫生大成问题，从而在两租界内引发了一些疫病的流行。最严重的是霍乱和痢疾的发生。据公共租界卫生处和法租界卫生处在9月15日发表的第三次报告，公共租界患霍乱的人数为258人，法租界患霍乱的人数达384人。<sup>①</sup>从8月30日到9月28日，仅公共租界各医院中收治的霍乱病者就有791人，到9月28日，其中已死亡148人，另怀疑患上霍乱病症的人也达1118人。<sup>②</sup>公共租界内还有一所专门的隔离医院，死亡人数则更多。自9月10日至19日的10天中，因患霍乱和痢疾而死者共为277人。<sup>③</sup>上海霍乱的严重，使香港当局将上海定为“时疫口岸”，凡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都必须先在上海其专门指定的地方进行身体检查，在取得合格许可证后，方能进入香港。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控制界内疫病的流行，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工部局曾对虹口、杨树浦来的战区难民过苏州河时，实施了检疫；<sup>④</sup>又专门建立了一座隔离医院，收治传染病人。两租界的卫生处并派出医生到各难民收容所指导卫生办法，特别是还很认真地在一些地方设点和派人、派车，上街免费为居民和难民接种霍乱预防针和牛痘预防针等。

第四，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大量难民涌入，又是战乱高潮时期，人员高度混杂、社会状况空前复杂。且不说战争双方在租界内频繁活动、互相对抗，这一期间，因乱世动荡、饥寒交迫等各种原因，铤而走险、偷抢害命等犯罪案件猛增。两界内盗匪充斥，恶势力横行，从室内到街上，杀人越货的重案也时有发生。为防止宵小之徒的扰乱和意外事故的多发，公共租界一再将宵禁时间提前，最早曾提前到从傍晚6时就开始（至凌晨5时）。<sup>⑤</sup>凡在此戒严时间，有逗留在外者，巡捕随时可以将其扣留。为了加强管理，两租界还都不断增加警务力量，这增加了行政开支，但仍难控制混乱局面。

如前所述，租界当局最“注重于维持所能切实控制区域内之安宁与秩序”，但上述各主要问题，直接和严重地威胁到了两租界的基本环境，为了要保持“安宁与秩序”，当第二次难民潮来到后，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征得中、日方同意，于9日在民国路和方浜路之间的旧城北部，开辟了“南市难民区”后，<sup>⑥</sup>租界当局便于10日正式宣布关闭全部铁门，封锁了

<sup>①</sup> 《申报》，1937年9月17日。

<sup>②</sup> 《申报》，1937年9月30日。

<sup>③</sup> 《申报》，1937年9月21日。

<sup>④</sup> 《申报》，1937年9月10日。

<sup>⑤</sup> 《申报》，1937年9月23日。

<sup>⑥</sup> 由于战区扩大，越来越多的难民向租界涌来，使租界不堪承受。为了解决这些难民的生存问题，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倡议在南市旧城内划出一个区域，建立专门的难民区。于是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发起，在

租、华两界的交通，于是就把成千上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难民排斥在铁门外了。

不过，尽管租界当局宣布关闭全部铁门，但实际上却并未严格地做到完全断绝租、华两界的往来，这一方面是由于铁门外前推后拥、抢天呼地的难民大潮势难抵挡，另一方面，面对陷于苦难境地、惨不忍睹的难民群，作为中立者的西方人还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尽管有一些巡捕在难民冲击时也会挥舞皮鞭、木棍）。因此，即使在宣布关闭的情况下，在有些时候，仍会短时间的打开铁门，让一部分难民进入，或者虽然不打开铁门，但为铁门的内外两边提供一定的方便。

法租界 10 日宣布暂时关闭铁门、封锁内外交通的当日，难民如潮涌入老北门铁门，法租界警务处加派巡捕、包探于铁门内外，“竭力维持秩序，使难民均摩肩接踵鱼贯而行，”但对“携有箱笼包裹者，则禁其进入租界，形迹可疑者，施以检查。”<sup>①</sup> 11 日，日机从早到晚对华界狂轰烂炸，南市非难民区的中国人为避轰炸，成千上万地向北面租界涌来。民国路上法租界各铁门前数万难民麇集“妇孺童稚，啼饥号寒，凄绝尘寰。”<sup>②</sup>在此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法租界当局将老北门暂时打开，让一部分难民进入（只进不出）。同时又打开南阳桥铁门，让租界内有事要去华界的难民出去（只出不进），两相单向流动，不致内外冲突。当时的报纸和不久出版的专书也作有其他的有关铁门开放的报道和记载：

“又有难民从东自来火街铁门上，越入租界约四五百人。”<sup>③</sup>

“十一日那天，南阳桥铁门只开放了一次，立刻大批难民进了租界。但不到五分钟，铁门依然闭上。”<sup>④</sup>

“现该队（指世界红十字会救护队）又于外滩一带，运出难民一千八百余人，送至安全地带。并于法华交界处，商得法工部局之援助，开放铁门一小时。”<sup>⑤</sup>

因当时处于战争的极度混乱时期，这些报道和记载也许不是非常的精确和全面，但是由于有些铁门固守不易，或因飞机呼啸、炮声隆隆，难民生死就在一刹那，有些地方的守卫者（或者也请示过上级）不免动了恻隐之心，而违背规定临时打开了一会铁门，这是完全可能的。

12 日以后，法租界铁门似对外关紧，不过，并不禁止界内向界外的难民输送他们最需要的食品。其时从各方奔逃而来被挡在法租界铁门外的数万难民，饥寒交迫，许多人已二、三日露宿于外，甚至没有一丝进食。两租界内的国际和上海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具有爱心的个人，购置了大批的大饼、馒头、面包等送至各铁门口。铁门不能开，这些食品便由守卫的中、法巡捕代向铁门外的难民抛送。但是，离铁门远的的难民，很难接到食品，于是各团体与个人又与沿民国路上的商店、住家相商，借他们的上层窗口或阳台，甚至到屋顶向远离铁门的难民抛送，“光饼（即大饼）与馒头等，纷纷如雨滴而下，且送食物者此去彼来，故历久不绝。”<sup>①</sup>对此，法租界当局和巡捕并不干预，而且是给予支持的。

与此同时，南市难民区的几万难民同样也食品匮乏，情势十分严重。由上海国际救济会和其他慈善团体、个人捐献的大批食品，在从租界要送出时，在铁门处交给世界和平会的专

---

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后，于 11 月 9 日正式成立。但这个难民区因处于华界内，且地小人多，并不能容纳所有的难民，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仍都没有保障，因此大量难民耽留于民国路上，侯机仍想进入租界。

<sup>①</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0 日。

<sup>②</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sup>③</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sup>④</sup>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46 页。

<sup>⑤</sup>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门职员，由他们转给难民区。在这方面，法租界当局给予了更大的方便，能让他们直接通过铁门直接搬移到难民区的。

在血腥恶战中面对陷于绝境中的中国难民，租界当局和西方人确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法租界如是，处于北边的公共租界同样也有相当的表现。在“八一三”战争史上，上海租界救援中国难民最为被称颂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公共租界的西线。在10月26日大场失守，中国守军撤向江桥、南翔一线后，10月27日，闸北、江湾、彭浦、真如、大场一带以前没有走掉的居民，特别是各村落的农民，顿失所依，如滚滚之潮逃向苏州河之南。这些居民且多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们在惊逃到沪杭铁路桥北端时，已是疲惫不堪，举步维艰：“大多数难民在走到铁桥北端都似乎要昏到，但仍挣扎着很费力的一步步跨过铁桥的枕木。老妇和孩子们的步武是不够枕木的距离的，于是跌的跌，爬的爬，叫的叫，哭的哭，那真可是极尽了人间的惨象。”其时上有日机的轰炸，后有日军的追击，前面是公共租界的铁网和铁门，难民真的落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就在这一时刻，守卫在桥南的英国军队和租界中西巡捕，毅然向前伸出了救助之手，一个身在现场的中国人，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的动人场景：“他们（指英军士兵）卷起袖管，用那粗壮多毛的手臂，从桥的彼端一次次的一手抱着一两个正在骇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龙钟的老妇或无力行走的妇人们走过桥来；一担担代难民们把衣被或食米挑过桥来；他们流着汗，一次又一次，我在那边的二小时中他们始终是那么像对自己的家人般真诚地对难民们援手。我亲眼看见难民们对他们感激得落下泪来，我亲耳听见难民们由衷地地诉说的感谢话-----”<sup>②</sup>

从苏州河北涌来的难民实在太多，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开放铁门数次，对要进者，“经驻军略施盘问，即予放行”；<sup>③</sup>又派出救护车，将被流弹击伤的人和妇女、小孩送往租界医院和安全地方；对租界内救济和慈善团体前来救援的车辆和人员，尽量给予帮助和方便。

10月27日公共租界英国驻军和租界巡捕奋不顾身地救助中国难民，及让难民避入租界的高尚品格，在上海广为传扬，各界市民对此深为感动和感谢。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等众多团体纷纷致函英国驻沪防守司令，表示深切谢意。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也特代表全上海市市民，向近二、三日内见义勇为助救涌入公共租界的中国难民，并对受伤者作“初步襄治”的英、美、意驻军，表示“深切之感忱”。<sup>④</sup>

#### 四，结语

“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的人们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天天幻想着天堂。”<sup>⑤</sup>

在枪林弹雨、大敌进逼，每个人的生命都随时可能被摧折的血腥形势中，中国难民如潮涌向两租界，他们把租界看作“安全区”，把租界比作为“天堂”。尽管进了租界也有衣食住行等种种问题，尽管在租界内完全有不能预知的何样前途，但当时难民最真实的感觉和最巨大的愿望是：“到租界上去，最近又最安全”；“冲进租界的人觉得很侥幸”；“走进天堂和地狱的关口，我们轻松地透了口气。”<sup>⑥</sup>因为在苏州河南的租界区，不会受到日机、日炮的狂轰烂炸（除偶然的因素外），不会受到法西斯军队的烧杀抢掠，至少，在这一大片的区域内，因避离了敌人和他们的暴行，生命就有可能得到相当的保障。而这一在战争中人们最基本的要求，对进入租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确实是达到了，因此，租界在当时被称作为“天

---

<sup>①</sup> 《申报》，1937年11月16日。

<sup>②</sup> 《申报》，1937年10月28日。

<sup>③</sup> 《申报》，1937年10月29日。

<sup>④</sup> 《申报》，1937年10月30日。

<sup>⑤</sup> 《申报》，1937年11月14日。

<sup>⑥</sup>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31页。

堂”，并不为过。

从租界一面来说，自“八一三事变”爆发起，其铁门基本是打开的，也即是对外开放的。仅至11月中旬，因局势变得格外的严峻，因租界内已人满为患，才不得不基本封闭铁门。但随着南市的很快陷落，华界城区已不再仍属战区，两租界铁门于是陆陆续续先后打开，旧有的交通仍恢复原样，难民们重返故里。这样，从总的来说，在战争期间，两租界铁门开放的日子为近3个月（8.13——11.9），闭门日为仅10天。开大于闭。

在这一期间，两租界共容纳了7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更深刻地说，因租界在中日战争的特殊的“中立”地位，还因有着租界内难以计数的中外团体和个人的真诚无私的不断帮助，这7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也就得以受到了保护，根本地避免了生命的危险。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对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八一三战争中的极其特殊的作用，及对中国难民的特别帮助，在当时就被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颂扬，如11月11日《大公报》中的时论作如下说：“在这次淞沪战事中，各租界当局及友邦人士给予我们的同情及援助已甚多，这是我们永永感念不忘的，最著者，如闸北退却之时，北区数万难民麋集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上，敌机在作惨无人道的扫杀，公共租界则开放铁门，尽数收容到租界里来。最近沪西南市数十万难民都向法租界涌，租界当局也量予放行。法国教会人士更倡议创设南市难民区，全活数十万生灵。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道与友情。”现今，当我们来重新全面认识、研究租界的时候，对它们在上海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作出的重大的贡献，当也是不应忽视和忘记的。

（原载《史林》2002年第4期）